

论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

管小平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对渭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诸多聚落遗址的调查和分析，并据现有考古学资料，揭示出该流域聚落间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以及差异性的规模化发展梯次，进而总结出渭河流域远古文化不同阶段的聚落演进状况，以及处于其中心地位聚落的历史变迁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聚落级差；新石器时代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35-05

本文所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指渭河流域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及其姜寨类型等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及晚期文化。“聚落级差”是指不同聚落之间规模及发展水平的差异^[1]。西方人类考古学者用“Settlement Hierarchy”(聚落等级)来定义聚落间的分级，并认为与之对应的是特定地域聚落集群主导权的层次分化^[2]。聚落级差的出现，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社会集团规模扩大，管理机构越复杂，从而形成多级多层次的社会政治结构，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在聚落形态上有所体现。聚落级差的分析不仅要借助于聚落面积的估算，而且要依凭聚落内部代表性遗物和遗迹等全信息式的考察。人类早期社会聚落级差的出现或聚落分化的发生，标志着特定地域聚落间的联系形式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演进。而在聚落间规模梯次细化过程的背后，还伴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位于级差化的聚落群之最高级别的中心聚落，在许多方面都更接近于萌芽阶段城市的原始形态^[3]。本文欲以渭河流域大地湾各时期的聚落遗址为分析主线，对应半坡及姜寨村落等仰韶时期的聚落遗址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一下该文化分布圈内的聚落级差。

一、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级差的始现时期

考古资料表明，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4]是有

别于半坡类型且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类遗存广泛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天水谷地、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附近以及东部的临潼、华县、渭南一带^[5]，主要有天水师赵村^[6]、西山坪^[7]、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8]、宝鸡北首岭^[9]、渭南北刘^[10]、临潼白家村^[11]、商县紫荆等遗址^[12]，其亦是我们探索聚落级差演进的重要材料。上述遗址一般位于依山傍水的较高台地上或两河交汇的地势较高处；面积较小，多在1~2万平方米之内；文化堆积较薄且多在1米以下。遗址分布零散而稀疏，遗物贫乏。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前仰韶时期）在河边二级阶地呈带状分布，长约120、宽约40~60米，范围约6000平方米。台地的东半部有4座圆形半地穴式房址，大小相近，面积仅有6~7平方米。其中一处坑式房址，面积约10余平方米，出土20余件陶、石、骨器及少量的炭化粮食，房址周围既有灰坑，又有墓葬。台地的西半部则为灰坑分布，当属于居住区的一部分。台地的中部和西北部发现有15座墓葬呈散点式分布，墓葬头向不同。目前尚未发现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我们无法从此类型的文化遗存来分析是否存在聚落级差，但从其清理出的灰坑、小型房址、石器以及陶器等遗迹可以看出当时聚落已具初步规模，当为聚落级差出现的萌芽阶段，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其始现

的重要参考。

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大地湾遗址二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早期。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主要分布在渭河二级支流清水河南岸的阶地以及与其相连的缓坡山地上,总面积11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中,先后清理房址240座、灶址98座、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以及沟渠12段,共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等8305件^[13]。对大地湾二期一段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其聚落内有围沟1条、房址37座、窑址1座、灶坑12个、灰坑22个,以及墓葬20座^[14](图一)。这种具有防御围沟、居住区、集体墓葬区以及早期手工作坊等功能区,且划分的较具规模化的早期聚落显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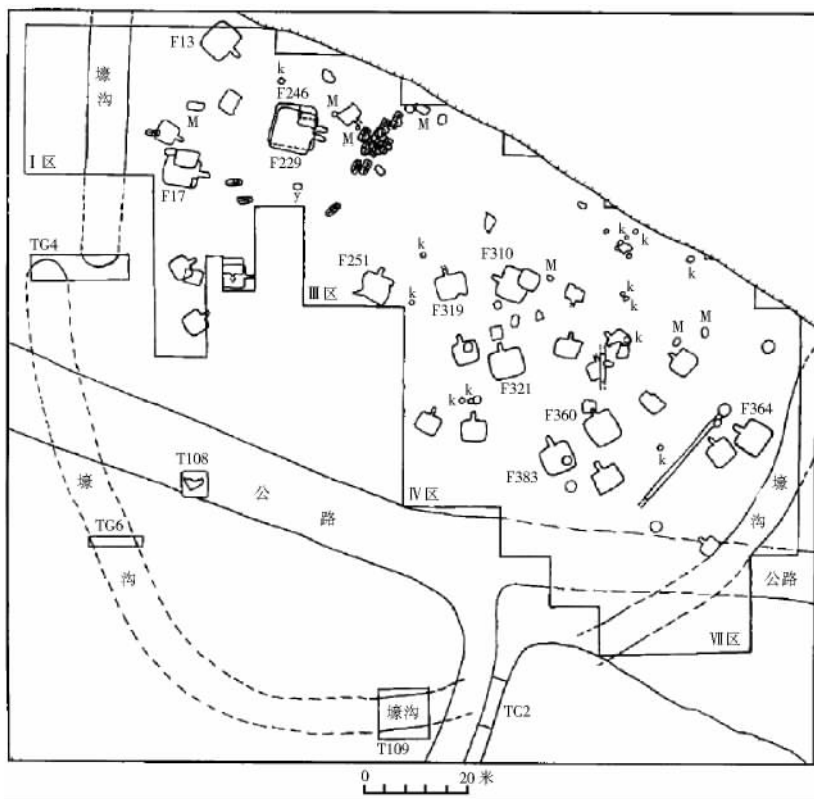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渭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大型聚落遗址。在其后续几次的发掘中发现,这种聚落文化已经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且聚落主体已从河边第二阶地向第三阶地发展延续。而在大地湾文化后期(第四、第五期),即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竟已发展到半山地带。而同时期的半坡类型、姜寨遗址等大规模聚落遗址亦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可见,以大地湾二期一段文化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存是渭河流域地区聚落级差始现时期。

二、一级中心聚落的形成

从考古学角度考察聚落级差,无疑要以聚落遗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和前提来进行。然而这种聚落遗址的比较,并非单纯的聚落遗址面积的对比,还应包括对于遗址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较。这是因为聚落级差不仅仅是一种规模意义上的差异,更是一种经济、技术上的差异。在聚落遗址中,哪一类遗迹最具代表性,能够帮助我们管窥聚落整体的规模和发

展水平?房屋及周边的日常生活设施遗存,无疑是聚落空间结构的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居住遗迹储存了聚落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全部信息。实际上,能够真正反映聚落特质的重要信息,常常来自于居住遗迹外围诸如环壕一类防御设施遗存、墓地等埋葬设施、反映当时人们意识形态的祭祀设施和反映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手工作坊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甚至是复原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状况。

有无环壕防御设施,是体现聚落级差的重要因子。在日本,因这种围沟多呈不甚规则的圆形环绕在聚落,特别是居住区周围,所以日本考古学界称其为“环壕集落”或“围廓集落”^[15]。本文依钱耀鹏先生的论文,将其称之为“环壕聚落”^[16]。环壕亦是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大特色。大地湾遗址、半坡聚落以及姜寨遗址都有环壕遗存。从大地湾遗址二期I段聚落可以看出,其南部已扩展到三级阶地的前缘,整体由壕沟围成近圆形,此段遗存均发现于壕沟之内。西部经发掘证实南北两段壕沟并不相连,系为各聚



图一 大地湾第二期一段聚落遗址平面图

(《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简报》)

落居民出入的通道。环壕是渭河流域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且半坡和姜寨两遗址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发现环壕的两处聚落^[17]。半坡聚落长达600多米的二层环壕结构以及分布众多的哨所遗存,更是显示出了其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核心地位。姜寨遗址的环壕更是保存完整,足以体现环壕在聚落区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而该流域其他地区的聚落遗址,不但规模较小,而且没有环壕发现,可见,环壕是聚落发达水平的重要尺度,是我们研究和探讨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级差的重要因子。

祭祀在远古先民时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姜寨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建造有大规模的集体广场。这些广场在当时不仅是用来集会和休闲的地方,还应是进行大型祭祀的重要场所。考古工作者在对半坡聚落遗址广场发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直立栽于土内的石柱及五组规律性地摆放的陶器坑,石柱周围土层有明显的烧火遗迹。有学者认为该遗迹是当时原始人进行祭祀活动遗迹。而石柱遗迹周围为部落中心广场,正是原始先民进行聚会、祭祀等大型活动的场所,正好印证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姜寨遗址广场墓地和北首岭广场墓地性质相似,应为当时沟外墓地居民的祭祀活动场所^[18]。墓葬特别是大型集体墓葬,是我们研究聚落遗址的重要因素,通过墓葬遗物及其葬俗、墓制建筑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该聚落的阶级分化、社会分工等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信息,由此可以推断聚落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单位所具有的社会地位。

大地湾四期聚落,达到该地域史前聚落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聚落南北中轴线上,发现了F400、F405、F901等3座面积均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房址。其中以F901最为宏伟壮观,占地420平方米,有主室、东西侧室、后室和门前附属建筑,是一座多间复合式建筑。这座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显示了建筑本身在聚落中的核心地位。它已不是一般部落的公共建筑,而应是举行大型祭祀、议事

活动的大会堂^[19]。且在中轴线附近还发现有其他大型建筑遗迹。由此可见,在仰韶文化中期,半坡、姜寨等聚落遗址均以广场作为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同时期,大地湾聚落居民已经将大型聚落祭祀活动转移在屋内举行,并且建造了规模相当、地位非凡的大型建筑。

聚落级差研究仍可依靠数量众多的房屋居址等人工构筑物展开。因为聚落是结合居住设施、手工作坊、墓葬、祭祀设施等为一体的集合体。房屋居址作为一种规模化的人工构筑物,需要一定量的劳动力投入方能完成。因此,这些大型遗迹能够反映其所属聚落的劳动力调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推断聚落的人口规模和聚落文化之间的等级差异。渭河中上游与下游的史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扩大,地域性特征越来越突出,文化分离的倾向亦日益加剧。前仰韶时期的大地湾一期房址同渭河中下游临潼白家发现的两座房址几乎完全相同。进入仰韶文化早期,这种规模化的人工建筑物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大地湾二期段的房址与其它遗址一样盛行瓢形灶坑,但平面形状却有明显的区别:大地湾、北首岭、师赵村均以近方形和长方形为主,仅有个别的圆形;半坡和姜寨则两类房址相并流行。大地湾二期段以后,区别进一步扩大,大地湾流行带草泥坎灶坑,并在灶与门道之间修建通风孔道,此特点其它遗址不见。至大地湾四期,风格独特的“凸”和“吕”字形平地建房屋已不见于大地湾以东地区,仅在附近的天水师赵村有所发现。宝鸡附近的福临堡二、三期与大地湾四期基本同时,但那里发现的9座房址中,8座为长方型和圆形半地穴式,仅有1座近方形地面建筑。位于关中的姜寨遗址与大地湾四期的区别更为显著,发现的7座房址中6座是圆形地面建筑,1座系方形半地穴式,大地湾此时既无圆形房址,也不见半地穴建筑。就整体建筑水平而言,大地湾四期明显高于邻近各遗址。尤其是大地湾四期大型会堂式建筑F901、F405,以规模宏大的布局、做工考究的地面,青石作础、整体性木架结构,已被视为我国仰韶文化最高建筑成就的代表性建筑。而大地湾四期恰是其

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故使得这种高级营造活动的出现有了可能。这种高级营造活动的出现,或许预示着文明社会的即将诞生,为我们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启示^[20]。

大地湾一至三期聚落基本选择在河边阶地;四期时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压力迫使人们向山地拓展。由第一期的台地散点式聚落,经第二期的台地环壕式聚落,发展到第四期的山地型中心聚落(图二)。即山地型中心聚落是聚落级差现象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文化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渭河上游地域,并已扩大至渭河中下游,甚至黄河中下游流域,显然已成为当时渭河流域的一级中心聚落;台地环壕式聚落的半坡聚落及姜寨遗址当为二级亚梯次聚落;台地散点式等其他聚落均为一般性聚落。这些聚落群由散点状的模式团聚在核心聚落周围,烘托出中心聚落的重要地位,这种由不同梯次的聚落构成的聚落群体是仰韶文化在渭河流域的重要文化特征。

从考古工作者对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姜寨村落是由五个氏族组成的凝聚式和

向心式聚落,面积约5万平方米。姜寨村落具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存在着不同级别的财产所有制:不仅拥有氏族公社的公共产业——陶器窑场,以及各氏族公社所拥有的畜圈、牲畜夜宿场、陶窑、制陶作坊、大房子以及窖穴等,还有家族私有财产如窖穴等家族所有制,此即所谓“三级所有制”^[21],整个村落由一条环壕围成不规则圆形,村落内部分工明确:居住区居中,东边和南边是墓地,西南边是烧造陶器的窑场。发掘中对墓葬的清理和研究得知,姜寨村落流行大型集体葬习俗以及二次葬,由此可以推断姜寨村落庞大的人口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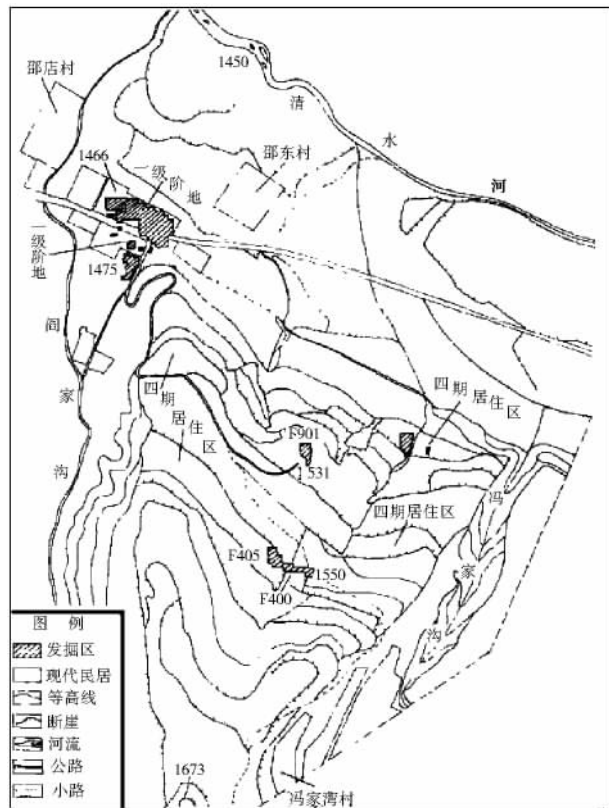
综上可知,渭河流域聚落级差起步较早,但比起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浙江地区的良渚文化聚落级差来说成熟稍晚。由于众多原因,渭河流域的聚落群体并没有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的城市,但从多方面的对比与分析,可以看出该流域聚落文化群已初步具备中国早期城市萌芽的基本特征。聚落级差是聚落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部分聚落在规模尺度和复杂程度上,凌驾于其他聚落,并逐步导致聚落级差的发生。因此,大型聚落的出现和城市的萌芽是聚落级差扩大化的体现^[22]。聚落级差应是生产技术进步与发展、社会结构变化、阶层分化以及礼仪制度的健全等几方面的因素,以导致资源分配的失衡和聚落关系的分化,进而发展成聚落间从对抗、联盟到统合,继而产生了超大型的聚落,即聚落遗址群。这也必然为早期城市的诞生提供了动力。对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级差的探讨,是研究当时社会进程、进一步认识和了解远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基本脉络和进一步探索渭河流域的文明萌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3] 王银平:《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6期。

[2] Timothy Earle, *Evolution of Chiefdom: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dited by Timothy Earle, PP.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nry Wright, *Recent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7-6.

[4] 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



图二 大地湾遗址第四期聚落布局图

(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试论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关于夏国家建立的原因，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致力于探寻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多从史前的战争和洪水在夏国家建立方面的作用进行探讨，或者将西方国家的产生模式与夏国家产生模式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夏国家建立的内在动力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提出社会有序性的需求是夏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社会有序性 夏国家 建立 原动力

中图分类号：K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4-0039-06

夏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为何能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建立国家？这一事件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一直以来讨论的热点问题。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机制是内动力而不是外动力。而与之有关的观点主要是战争与洪水这两个主要因素。本文也认为

中国文明形成的机制是内动力而不是外动力，但为什么本是邦国林立的多元多中心格局而最终结果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脱胎于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这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重点。本文认为，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历史的、政治的、环境的等诸方面的因素，战争和洪水是其催化剂，但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有序性的需求。

《考古》1979年第1期。

[5] 张宏彦：《渭水流域老官台文化分期与类型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天水市西山坪早期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5期。

[8] 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队：《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1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1]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白家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史研究》1983年第2期。

[1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博》1987年第3期。

[13][14]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6期。

[15] 石黑立人：《全国环壕集落地名表》，季刊《考古学》第31号，雄山阁山版，1990年5月。

[16][17] 钱耀鹏：《关于半坡遗址的环壕与哨所——半坡聚落形态考察之一》，《考古》1998年第2期。

[18] 张治强：《姜寨遗址半坡文化墓葬分期试析》，《考古》1999年第12期。

[19][20] 郎树德：《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古》2003年第6期。

[21] 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 刘恒武：《良诸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